

怎样看国民党同意新四军开赴江南敌后

刘岳化

在新四军史研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国民党蒋介石同意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江南^①敌后抗日，是企图“借刀杀人”^②，“企图借日军之手消灭新四军”^③。理由是：江南是日伪统治的中心地区，敌情严重；又是平原水网地区，游击队不便活动。笔者对这种“借刀杀人”说不能赞同，现简述一孔之见如下：

一、放手到敌后去发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是中共中央的方针。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表示了抗日决心，调动部队进行抗战。但是，由于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同时由于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中国军队在抗战初期连连失利，大片国土沦丧。

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提出：要“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④会议要求党和红军站在抗战的

① 抗战前期，江南指江苏省长江以南地区。国民党在这里设有江南办事处、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新四军设有江南指挥部。

② 《新四军史料研究集刊》1988年1期6页，新四军纪念馆编印。

③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安徽史学》1990年4期。

④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1937年8月25日洛川会议。

最前列，把工作重点放到战区和敌后去。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会议确定红军以创建根据地，牵制和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和保存与发展自己等为基本任务，并确定红军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实行国内正规战向抗日游击战的军事战略转变，使游击战争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使命。^①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正是遵照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迎着日军进攻山西的锋头挺进敌后的。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等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就是游击战争（要发动党内党外）。”^②

对华中地区，中共中央指示长江局，要趁南京徐州失守后，日军集中主力进攻武汉而后方空虚的有利时机，迅速动员组织大批力量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并严肃指出：“为此目的，武汉城市工作受到部分损失是不应顾惜的。”^③

中共中央的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抗日是当时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党和八路军、新四军要抗日，要发展，就必须到敌后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优势和军事特长，有力地打击和牵制敌人，提高自己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才能冲破国民党的束缚和限制，迅速壮大自己的力量，建立和不断扩大抗日根据地。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把一切抗日势力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遏制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倾向，坚持抗战到底，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并使抗日战争

① 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126—12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11月出版。

② 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85—86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

③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长江局电，1938年5月22日，《新四军文献（1）》11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

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

二、新四军到江南敌后抗日是中共中央的指示。

新四军虽然名义上列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受第三战区节制，但它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新四军的内部建设、工作任务和一切重大行动，都是按照中共中央指示或报请中共中央批准的。战区给新四军的任务，也要经中共中央同意才能执行。这个原则，国民党也是清楚的。

早在新四军各部队从原根据地出发向皖南集中之前，项英、陈毅就于1938年2月14日致电毛泽东，提出了新四军行动原则的建议：“我军不住岩寺，尽可能向前伸出到浙、苏、皖之昌化、绩溪、孝义〔丰〕、宣城、宁国……以游击战在战略上配合正规军为原则，受领一定任务，机动的完成。”^①电报中所讲的5个县，除宣城县城被日军占领外，其余4个县均未沦陷。其中绩溪、昌化距中日两国军队对峙线有100公里左右。项英显然是想把新四军部队摆在中国控制的地区一侧，只在敌占区边沿打游击。这是不符合前述中共中央方针的。毛泽东于15日即复电项英、陈毅，指示新四军要到江南敌后去。电报说：“同意十四日电的行动原则，力争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地。”^②新四军在岩寺集中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于4月17日致电蒋介石报告说：新四军“点验完毕后，拟令该军于溧日（即23日——作者注）由岩寺经泾县推进至南陵附近，尔后即向当涂、溧水、天王寺、丹阳、镇江、南京一带地区从事游击。”^③以上说明，新四军到江南敌后以茅山山脉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首先是中共中央提出来的，经新四

① 《新四军·文献（1）》211页。

② 《新四军·文献（1）》212页。

③ 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七八七，目录号2101。

军领导人与第三战区交涉，后来顾祝同给新四军的任务和地区，不过是接受了中共方面的意见。

其实，中共中央不仅要新四军进军江南敌后，而且要新四军不受国民党的限制，向大江南北所有敌后地区发展，行动尽可能快些。1938年5月4日，毛泽东致项英电：“在侦探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进，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①不久，党中央又进一步指示：“新四军正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的积极的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去”。^②“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③如果说国民党军事当局要新四军到江南敌后抗日是“借刀杀人”，那么，中共中央要新四军不必等国民党方面同意，“主动的积极的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去”（不只是江南），岂不成了“自投罗网”了吗？

三、国民党当局的意图，是要八路军、新四军在它的统一指挥下担任正面战场的阵地防御战。

蒋介石被迫联共抗日以后，他的反共本性并未改变。从谈判红军主力改编问题开始，他就企图借机控制和削弱红军，经过中共方面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加上日军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压力，蒋才被迫让步，同意了中共方面提出的改编方案。在作战问题上，蒋强调统一军令政令，要八路军在他的统一指挥下作战，也就是在整个国民革命军编成内参加正面战场的阵地防御战，抗击日军的进攻。这样，即可以限死八路军的行动，又可以削弱八路军的实力。蒋介石欲借抗日之机排除异己，削弱或兼并许多地方杂牌军，大大扩充他的嫡系部队。

^{①②③} 《新四军·文献（1）》111页，112页，132页。

毛泽东及时识破了蒋介石这一阴谋。指出：“或者他们含有恶意，即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①他指示周恩来、彭德怀到南京和山西时，都要向国民党当局“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取得他们的彻底了解与同意……此原则中包含：（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府和邻近友军不得干涉……（三）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②经过谈判，蒋介石、阎锡山同意了这个基本原则。在忻口战役和太原保卫战中，八路军正是按照这个基本原则在敌后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

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集中后，第三战区原来拟令新四军担任高淳、水阳地区的正面防御任务，企图“划地为牢”并假手日军削弱和消灭新四军。如前所述，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坚持不担任正面阵地防御打硬仗，要求到江南敌后去开展游击战争。经过交涉，顾祝同作了让步，改令新四军到江南敌后游击。新四军则根据实际情况，“机动的完成”。由于新四军到敌后冲破了国民党的限制，也不依靠它发饷、发枪，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给日伪军以越来越大的打击，部队迅速壮大，根据地也不断扩大。新四军在敌后的发展，震动了日伪统治，也震动了国民党当局，顾祝同哀叹：“江南沦陷的二十六个县区，已成了陈、粟的自由天地了。”^③这也说明，新四军到江南敌后抗日，并不是国民党当局本来的意图。

四、“借刀杀人”说源于项英，中共中央为此对他多次进行说服教育。

1938年3月18日，项英致毛泽东、陈绍禹、周恩来电，认为

①② 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81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

③ 夏云心，《巫兰溪谈话实录》，转引自《抗日战争史事探索》71页，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出版。

顾祝同要新四军经南陵去茅山“显系借刀杀人，如去茅山，应由广德、宣城或广德与安吉之间插出，不应出南陵”。^①这个电报是目前见到的“借刀杀人”说的最早的历史文件。对此，党中央并不同意项英的看法，毛泽东于3月21日复电项英：“未知南陵一带地势如何，如系山地，开经南陵一带亦未为不可。因敌犯长江上游时，南陵一带居于敌之侧后，正好活动。”^②4月29日、项英在致毛泽东等电中再次提出：第三战区“显然是将我们送到敌区，听其自生灭，含着借刀杀人的用意”。^③在项英看来，江南是日伪统治的心脏地区，且地势平坦，江河湖泊多，无大地地依托，不适于开展游击战争，“使我们在极困难条件下进行最困难的任务”。^④怎么办呢？他决定采取拖的办法，每日前进“三十里路行程”，“延拖时间”。^⑤这种认识和做法，是违背中共中央的方针和指示的。由于项英“过高估计了敌情，强调在平原水网地区行动困难，犹豫迟疑，因而坐失了挺进江南敌后的最有利时机”。^⑥

针对项英这种错误认识和消极态度，党中央对他进行了耐心的严肃的说服教育。毛泽东在收到项英4月29日来电后，就看出了他的畏难情绪，立即在5月4日复电项英，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⑦针对项英认为平原地区难开展游击战争的错误认识，中共中央指出：“根据华北经验，在目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亦便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游击根据地的创立。我们在那里更

①②③ 《新四军·文献（1）》213页，214页，216页。

④⑤⑦ 《新四军·文献》216页，217页，111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439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2月出版。

能自由的发展与扩大自己的力量与影响。只要自己不犯严重错误与慎重从事，是没有什么危险的。”^①6月2日，毛泽东又致电项英鼓励说：“地区扩大已不患无回施余地，望根据战争的实际经验，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我军均可派队活动……敌之总目标在进攻武汉，你们可放手在敌后活动。”^②但项英未能真正转变思想，认真贯彻中央精神。他一直株守皖南。迟迟不到敌后去，还想把已到敌后部队调回皖南，准备向南发展。对此，党中央指出：“皖南发展较难，江南发展较易”。^③至于向南发展，中央更严肃地明确指出：“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④由于项英固执己见，行动迟疑，后来给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提供了可乘之机。

五、通过对以上历史文献和历史事实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1、新四军到江南敌后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是中共中央的指示，国民党军事当局让新四军到江南敌后去抗日是中共方面争来的。江南工农业发达，交通方便，气候适宜，物产丰富，是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敌、友、我三方都很重视。新四军挺进江南敌后，威震敌伪统治中心地区，有力地打击和牵制了敌人，提高了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威信，建立了华中敌后第一个战略支点。这对于贯彻中共中央要求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意义重大，成为后来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和向南发展的前进基地。如果把新四军挺进江南敌后抗日说成是国民党的“借刀杀人”，就必然会导致曲解中共中央的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轻视开辟江南敌后根据地的重大意义。

^{①②③} 《新四军·文献（1）》112页，115，142页。

^④ 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编）57页、6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1月出版。

2、对于蒋介石这样至死反共的人物，也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不能因为他一贯反共，就把他的一切言行都归结成是为了反共。中国共产党认为，“国民党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限制比较少^①，那时“顾祝同较开明”^②。在当时形势下，蒋介石同意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抗日，是顺应形势顺应民心的表现。他曾试图要新四军参加正面战场的阵地防御战，是含有“借刀杀人”之意的。在中共方面拒绝后，他作了让步，同意新四军到江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这是有利于新四军抗日的。

3、项英由于受到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对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同时，囿于长期在偏僻山区游击的习惯和经验，因而把在敌伪统治中心区域的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视为畏途，缺乏信心。这样，就难免会产生认为新四军开赴江南敌后是国民党当局“借刀杀人”的错误观点。然而我们研究历史问题，则应从当时国内整个政治军事形势着眼，全面考察国共两党的抗日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对这个问题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指挥学院）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95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出版。

② 《新四军·文献（1）》115页。